

杜
经
国
著

左 宗 棠 与 新 疆



左宗棠与新疆

杜经国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左宗棠与新疆 杜经国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375印张 100千字

1983年 2 月第一版 1983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4,000

统一书号: 11098·33 定价: 0.43元

前 言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多年来，人们往往把他同曾国藩、李鸿章并称，看成反面人物。实际上，曾、左、李之间固然有相同的一面，他们都是晚清时候的封疆大吏，都是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起家的所谓“中兴名臣”，但他们之间也有区别，这主要表现在，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是清末搞投降外交的代表，缺乏民族气节，而左宗棠却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

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者，左宗棠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粉碎了俄、英帝国主义瓜分新疆的阴谋，收复和保卫了祖国的这一片大好河山。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中亚浩罕汗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率兵侵入南疆，悍然建立所谓“哲德沙尔汗国”，对新疆各族人民进行极为野蛮残暴的统治，并妄图把新疆从我国分裂出去。

阿古柏的分裂活动，得到俄、英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它们采取武力威胁和拉拢收买等手段，要阿古柏充当自己的走狗。并无视我国主权，先后同阿古柏签订不平等的通商条约，攫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特权。

在这方面，沙俄的表现尤为凶恶。它一面与英国争夺阿古柏，一面又利用阿古柏侵入南疆，清政府在新疆统治力量

削弱的机会，直接出兵北疆，于一八七一年七月侵占了伊犁地区。这就使新疆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了，清军仅保持哈密、巴里坤至吉木萨尔一线，西北边防岌岌可危。

当时，左宗棠正在陕甘总督任上，他对新疆局势的发展一直非常关切，对沙俄悍然侵占伊犁的暴行尤为愤慨，建议清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早日收复新疆，把沙俄侵略者赶出伊犁。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统治集团内部是有分歧的。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些人，借口加强东南海防，竟主张放弃新疆，把它交给俄、英帝国主义去摆布。李鸿章的卖国主张遭到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一派人的坚决反对，双方争论十分激烈。清政府权衡利害，终于采纳了左宗棠的正确主张，于一八七五年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积极准备收复新疆。

一八七六年七月，左宗棠进军新疆，讨伐阿古柏。热爱祖国的新疆各族人民，身受阿古柏匪帮的残酷压迫，强烈要求清政府收复失地。他们欢迎清军，有的还举行武装起义，配合作战。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清军节节取胜，到一八七八年一月，就收复了除伊犁地区外新疆的全部领土。阿古柏被部下杀死，其残余势力在沙俄的庇护下，逃到了沙俄境内。

新疆重返祖国怀抱，首先应该归功于新疆各族人民。但是，左宗棠作为进军新疆的全军统帅，他个人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新疆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给行军作战带来了不少困难。左宗棠因地制宜，制定了一套切合实际的战略战术。他非常注意军队的后勤供应，每战之前都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不仅考虑到要用多少兵、需要多少粮草、用多少车驮、运到何处、供多长时间的给养，而且考虑到天

时地利，力避严寒酷暑，以便大军前进不受气候的影响。他还特别注意民心向背，曾三令五申，要兵勇搞好同当地各族人民的关系，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清军的胜利进军。

新疆南北两路收复后，左宗棠开始全力投入收复伊犁的斗争。

沙俄侵占伊犁之初，曾欺骗清政府说，它只是“代为收复”，俟清军赶走阿古柏后，一定“立即交还”。沙俄之所以这样表示，是由于它估计清政府根本没有力量收复新疆，它不仅永远霸占伊犁，而且可以利用阿古柏为工具，最后吞并整个新疆。左宗棠的胜利进军，粉碎了沙俄的迷梦。于是，它只好食言而肥，拒不交还伊犁。

一八七八年六月，清政府派崇厚赴俄谈判收回伊犁。昏庸的崇厚在沙俄的威胁愚弄下，竟于次年十月擅自签订了一个丧失大量领土和利权的《交收伊犁条约》，换回了一个险要尽失、三面临敌的伊犁孤城。消息传来，舆论哗然，清政府也拒绝批准这个条约。

左宗棠原来还希望通过外交途径，以和平的方式索还伊犁。这时，他已认识到，和平谈判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做好战争准备，以便在必要时诉诸武力。一八八〇年，清政府派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左宗棠则在新疆积极备战。这一年五月，他亲自出关，移行营于哈密，以便就近指挥，与沙俄侵略者决一雌雄。

当时，沙俄正摆出一副大举入侵的架势，不但在我国东北和西北边界聚集大批兵力，甚至出动黑海舰队到中国海面游弋示威。左宗棠并没有被沙俄的气势汹汹所吓倒，相反，他决心同沙俄兵戎相见，不仅要收复伊犁，而且要收回它历

来侵占的我国其它领土。可惜，正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懦弱无能的清政府，慑于沙俄的威势，竟决定把左宗棠由新疆前线召回北京，以致他的雄心壮志未能付诸实践。

但是，左宗棠在新疆的战备工作，曾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据曾纪泽透露，当清政府召左宗棠赴京的消息传到彼得堡时，俄方不明底细，以为左宗棠到北京是研究如何出兵伊犁的问题，曾极为关注，多次探询此事。因此，一八八一年初曾纪泽在彼得堡同沙俄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虽然也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但比起崇厚所订的旧约来，中国总算多少争回了一些利权。

左宗棠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封建政治家，他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就考虑如何做好善后工作，为“新疆划长治久安之策”。在这方面，他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如兴修水利、开荒屯田、整顿币制等等。但他认为最重要的善后工作是在新疆建省，取消早已腐朽不堪的军府制度，实行与内地大体一致的政治管理，进而整饬吏治，发展经济，建设新疆，巩固边防。由于他的一再呼吁，一八八四年冬，清政府终于决定在新疆建立行省，设置州县。从此，新疆的局势基本上稳定了下来。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外国侵略者对它虎视眈眈，馋涎欲滴，而清朝政府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卖国势力又已逐渐占了上风。如果不是左宗棠力排众议，不畏艰难险阻，进军天山南北，那末，祖国的这一片大好河山就可能沦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斗争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他的这一功绩应当载入史册。

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左宗棠一生中也干了不少坏事。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西北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就是他的严重罪行。但我们既不能因为他镇压太平天国和西北人民的反清起义而抹煞他收复新疆的功劳，也不能因为他收复了新疆而原谅他镇压人民起义的罪行。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评价左宗棠的一生功罪，必须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考虑到地主阶级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反动阶级，它的一个基本动向就是向帝国主义逐步投降，最后同帝国主义结合起来，充当走狗，共同奴役中国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中，在国内阶级矛盾上升的时候，镇压农民起义的，比比皆是；而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能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却寥若晨星。如果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还有林则徐、龚自珍、魏源那么一批人的话，那末，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象左宗棠这样坚持抵抗外国侵略的人，就更加屈指可数了。因此，对于这样的历史人物，当然应当给予公正的评价。

本书不是对左宗棠的全面评价，只是就他在新疆的斗争做一个简略的概述。因为研究这个斗争，总结历史经验，在目前情况下，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自己水平有限，对新疆的历史又缺乏系统的研究，因而在观点和材料的运用上，错误和不妥之处一定不少，衷心希望得到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在写作过程中，曾参考运用不少同志特别是新疆史学界同志们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谢！

著者

一九八〇年八月一日于兰州

目 录

前 言	1
一、少年怀壮志，一片爱国心	1
二、新疆在危急中	15
三、海防与塞防之争	30
四、兵、饷、粮、运	55
五、进军天山南北	82
六、收复伊犁的斗争	110
七、建立行省，设置郡县	135

一、少年怀壮志，一片爱国心

左宗棠是湖南省湘阴县人，公元一八一二年（清嘉庆十七年）出生在湘阴东乡左家墩一个小地主的家庭里。祖父和父亲都是穷秀才，家里只有四十亩田，人口又多，仅靠地租收入不够维持生活，因此，他们都不得不大半辈子在私塾里当老师，以教学所得的收入填补家用。

左宗棠五岁那年，他父亲迫于生计，携家来到湖南的省会长沙，在左家祠堂里办了个私塾。这一年，左宗棠开始跟父亲读书。他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天资又聪明，学业上进步很快，深得父亲的喜爱。当时的学童，除了必须熟读《百家姓》、《千字文》这一类启蒙读物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外，到一定的年龄，就得学习对对子，做八股文，准备将来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谋得一官半职。对对子需要巧思，对某些天资较高的学童来说，往往是卖弄聪明的好机会，也是一种乐趣。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吧，左宗棠从小就很喜欢对对子，一生中曾做了不少很出色的对联。他早年得到两江总督陶澍的赏识，就是由于对联做得好。有一次，陶澍在北京觐见皇帝后，回故乡湖南安化探亲，路过醴陵。左宗棠正在那边的渌江书院里教书，知县给陶澍预备公馆，请左宗棠做了几副门联，其中一副是：“春殿语从容，十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

归。”（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七一八页）上联讲的是觐见时道光皇帝问起陶澍家里的一块印心石，并题给“印心石屋”四个字一张匾额的故事。陶澍见了大为赏识，知是左宗棠的手笔，便请来相见，谈得十分投机。两人从此订交，后来还结了亲家。

但左宗棠对充满清规戒律和陈词滥调的八股文却一向不感兴趣，他从小求知欲就很强，最喜爱的功课是历史和地理。这是一个无限广阔的领域，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可以任他尽情驰骋。他在这方面花了很多时间，十八、九岁时就读完了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这都是一些大部头的著作，读起来是很费劲的，有些热衷于科举功名的人嘲笑他不务正业，他根本不为所动。这几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名著，使他还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对祖国各地的山川形势、风俗人情和历代疆域沿革、战守机宜有了初步的了解。

左宗棠十六岁时死了母亲，十九岁那年，父亲又因病去世。这对他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当时，他的两个哥哥，一个早已死去，一个又远在他乡。他住在长沙，无亲无靠，生活越来越困难，有时连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处境是相当狼狈的。幸好，就在这一年，湖南的知名学者贺长龄回到长沙，看到他的困境，很是同情。那时，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正主讲于长沙城南书院，贺长龄就通过这个关系把他介绍到城南书院继续读书，靠书院里的奖学金解决衣食问题。

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走向衰落，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南方的天理教，北方的白莲教发动的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绝；西方殖民

强盗开始叩击中国的大门，外国侵略者与中华民族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封建制度已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到了“日之将夕”的地步。为了克服这个危机，地主阶级中一些有远见的爱国士大夫，象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都大力提倡所谓的“经世致用”之学，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注意研究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不要沉湎于脱离实际的八股章句。龚自珍的著名诗篇，“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龚自珍全集》第二五一页）就反映了这些人的呼声和愿望。

贺长龄是当时的著名学者，曾同林则徐、魏源一起在两江总督陶澍手下共过事，彼此有很深的交往，政治思想基本一致，在学术上都是主张经世致用的。他还特地把嘉庆以前一些著名士大夫关于国计民生的论文汇集起来，编成一部书，叫做《皇朝经世文编》，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同左宗棠接触后，对这个不喜欢八股章句而注意研究实际学问的青年是很欣赏的，认为是个后起之秀，知道他家里穷，买不起书，就主动地把自己丰富的藏书借给他阅读。左宗棠每次还书时，贺长龄总要问他读后有什么心得体会，同他一起研究讨论，给予启发和指点。还经常勉励他说：现在一般的读书人，大都是庸庸碌碌，鼠目寸光，只关心自己的功名利禄，不顾国家安危。象你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努力自爱，不要随波逐流，争取今后能干出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业来。

左宗棠才气横溢，个性倔强，从小“志大言大”，自命不凡，经贺长龄这一鼓励，更加自信了，决心为解决封建国家的内忧外患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左宗棠在学术上已经明确地走上了经世致用的道路，在

政治上已经成为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士大夫集团的一个积极的追随者了。

左宗棠二十一岁时同湘潭周家的姑娘叫做贻端的结了婚。周家是湘潭有名的大地主，很有钱，左宗棠却是个穷书生，自己无力成家立业，只好到周家做了个上门女婿，暂住在周家的西楼上。周夫人虽出身大家，倒很贤淑，并不嫌丈夫穷。她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博通书史，长于吟咏，经常同左宗棠互相唱和。有一年，左宗棠在外乡教书，周夫人怕他客馆寂寞，特地做了一个枕头寄给他，上绣《渔村夕照图》，还题了一首七绝：“小网轻舸（音刀 dáo）系绿烟，潇湘暮景个中传。君如乡梦依稀候，应喜家山在眼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十八页），真是寥寥数语，情意缠绵！左宗棠对周夫人也很敬重，他一生在私生活方面始终是比较严肃的。

同周夫人结婚的这一年，左宗棠在长沙参加科举考试，中了举人。第二年年初，也就是一八三三年的春天，他到北京参加会试，想考个进士，但由于诗文不合主考官的口味，没有被录取。此后，又考了两次，仍然没有中，他的科举功名也就到此为止了。后来，他虽然做了很大的官，甚至获得了东阁大学士的头衔，论出身，却只是个举人。据说，他因此一辈子瞧不起进士出身的人，认为进士都是没有学问的，见到举人，却很敬重。这也说明他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有时不免流于偏激。

一八三三年，左宗棠在北京逗留期间，通过师友往还，耳闻目睹，对当时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严重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伤时感事，写了一些忧国忧民的诗篇，题为《癸

已燕台杂感八咏》。其中有一首写道：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橐（音 佗 tuó）
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置省尚烦它日策，兴
屯宁费度支钱。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左文襄公全集·诗集》，第二页。）

这是一首关于新疆的诗，第三、四两句讲的是西北地区运输和给养的困难；第五、六两句则主张在新疆建立行省和兴办屯田，以加强祖国的西北边防。当时，沙俄正加紧侵略我国的东北和西北边疆，节节进行蚕食，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清政府中不少爱国士大夫的严重关切。左宗棠这首热情洋溢的诗篇，说明他早在青年时代就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就非常关心祖国新疆的命运了。

此后多年，左宗棠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对当时与封建政治有密切关系的许多学问，诸如历史地理学、农学、水利、盐政、漕运，都进行了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他对农学很有兴趣，不仅遍读了历代讲农事的著作，还亲身实践，抽暇同农民一起栽桑、养蚕、种茶、插秧，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农事知识。但他最感兴趣的仍然是历史地理学，在这方面花的时间也最多。在周夫人的协助下，他绘制了一套历代疆域图，把各个朝代疆域演变及其与兵事的关系都弄得清清楚楚；又摘抄各省通志和西域图志，把山川、关塞、驿道、城池，分门别类，汇集成几十大本，作为研究问题时的参考。他对新疆的史地尤有兴趣，对新疆地区的情况相当熟悉，曾同当时著名的西北历史地理学家、《西域水道记》和《〈汉书·西域传〉补注》的作者徐松有过交往，徐松还把自己有关新疆的著作送给他，请他提意见。后来，他在收复新疆过程中的一

系列军事部署之所以有条不紊，切合实际，就很得力于他对新疆史地的精熟。

由于多年的刻苦钻研，左宗棠二十七、八岁时，学识已经相当丰富了，受到不少师友的称许和推崇。他的老师贺熙龄对他的许多见解十分赞赏，曾做诗夸奖他：“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还加注说：“季高（左宗棠字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瞭如指掌。”（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一，第十八页。）

一八四〇年，左宗棠二十九岁那年，英国侵略者挑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他正在湖南安化陶澍家里教陶澍的儿子读书，住在乡下，消息是很闭塞的。但是，他对战局的发展一直非常关心，当他得悉清军连吃败仗，英国侵略军攻陷浙江定海，兵船已闯到天津附近的时候，曾表示极大的忧虑和愤慨，并在给贺熙龄等人的信里，对这一仗应该怎么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还写成《料敌》、《定策》、《器械》、《用间》、《善后》诸篇，讨论战守机宜。其中有不少意见是很正确的，同林则徐等人的主张基本上不谋而合。

左宗棠对投降派的卖国行为极为痛恨。一八四一年初，当卖国贼琦善私立《穿鼻草约》，出卖香港的罪行被揭发，道光皇帝感到失了“天朝”体面，气极败坏，一怒之下把琦善锁拿进京治罪时，他一面拍手称快，一面又感到不满足，认为琦善“以奸谋误国，贻祸边疆，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将士无自固之志，东南海隅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其罪不可仅与一时失律者比。皇上欲伸天讨，似宜驰使封剑，斩首军前，数其输国之罪，布告中外，庶有以壮三军之

气而寒彼族之胆。庙堂（指朝廷）战胜之策，无愈此者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第十六页）但是仅仅杀掉一个琦善能够解决问题吗？他是没有多少信心的，在给贺熙龄的信里曾愤慨指出：“以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顺之私，令天下事败坏至此。百尔君子未闻有以公是公非诵言于殿陛间者。仕风臣节如此，古今未有也。天下无不了之事，无不办之寇，亦未尝无了事办寇之人。然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则正未可知耳！”（同上，第十九页）对清政府的现行政策表示失望和不满。因而，当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时，他说：“洋事卒成和局，实意念所不到。市不可绝，则鸦片不可得禁。自此亿万斯年之天下，其奈之何！”在极度愤慨之余，他甚至想找一个人迹罕到的地方，隐居起来，苟全性命于乱世了（同上，第二十二页）。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左宗棠同林则徐还没有直接的交往。但由于思想上的一致，他对林则徐的为人是很钦佩的。对林则徐无故被遣戍新疆的遭遇更是非常同情。一八四八年，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时，胡林翼推荐他去当林则徐的幕僚，他因正教陶澍的儿子读书，一时无法离开陶家而辞谢了。但他在给胡林翼的复信里表示：“僕久蛰（音哲 zhé）狭乡，官保（指林则徐）固无从知僕。然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官保与陶文毅（指陶澍）往复书疏，僕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来，行河、出关、入关诸役，僕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尝自笑耳！尔来公行踪所至，而西北，而东南，计程且数万里，海波沙碛，旌节弓刀，客之能从公游者，知复几人？乌知心神依倚，惓惓相随者，尚有山林枯槁未著客籍之一士哉！”（《左文襄

公全集·书牍》卷一，第四十九——五十页）这绝不是寻常的客套，而是出自肺腑的景仰之情。

一八四九年，林则徐因病辞官回福建原籍，船过长沙时，左宗棠曾特地到船上去拜见他。两人一见如故，“谈达曙，无所不及”，林则徐遣戍伊犁时所兴办的水利、屯田事业，更是话题的中心。据胡林翼说，林则徐对左宗棠的学识是很欣赏的，“文忠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

（《左文襄公年谱》卷一，第二十五页）这虽不免有些夸张，但林则徐当时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身体又不好，居然同一个素昧平生的晚辈海阔天空地聊了整整一夜，也确实可以算是“倾倒”了。

一八五〇年，林则徐去世的消息传来，左宗棠很悲痛。他在给林则徐的儿子林镜帆的信里说：“忽闻官保尚书捐馆之耗，且骇且痛，相对失声。忆去年此日，谒公湘水舟次，是晚乱流而西，维舟嶽麓山下，同贤昆季侍公饮，抗谈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响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何图三百余日，便成千古！人之云亡，百身莫赎，悠悠苍天，此恨何极！窃维公受三朝知遇之恩，名业在霄壤，心期照古今，血气之伦，罔不爱慕，於公復何所憾？中间事变叠乘，艰危丛集，群小比而忌公，天日高悬，旋蒙鉴察。彼人之心，徒极缁纆，亦所谓睡不及天还以自污者也。士之爱慕公者，亦何所恨？唯公剔（音梯tī）历中外三十余年，经纬万端，巨细俱关国故，史馆列传，例只鈔撮谕旨章疏，于我公盛节苦心，不能缕述百一，若非行状家传，质实陈叙，是使我公心事不尽白于天下后世，而当年国是，亦将无所徵信。此则海内外知公者不能无重望于仁人